

宋代廉州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对外重要口岸

■ 李志俭

《汉书》关于汉代官方船队由合浦等地起航经东南亚抵印度半岛的历史文献记录，是合浦（北海）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最早记载。然而，《宋史》关于宋王朝“诏许交趾互市廉州”，以及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一书关于廉州航海、造船、贸易的历史资料，证实合浦是宋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重要门户。因此，客观地反映和研究宋代廉州（合浦）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及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和贡献，对当前我们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牢牢树立海权和开发海洋意识，加快广西北部湾经济开发的建设步伐，具有启迪和指导意义。

一、宋代廉州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对外重要门户的客观原因

宋代是廉州海洋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兴旺时期。据《合浦县志·事纪》记载，公元971年，北宋灭掉南汉，并派兵迅速占领廉州后，马上宣布“大赦”，并且免除老百姓两年赋税，还颁布法令“禁鬻男女”，即禁止贩卖人口。接着，采取利民措施，“废媚川都，罢常乐州，以其地分合浦、石康二县”。这样，对促进合浦的安定和恢复生产十分有利。次年五月，宋太祖亲自“命罢采珠”，恢复合浦珠民旧业，任其自由采珠和经商。开宝七年（974年）四月，宋太祖“定岭南贼律”，实行法治，使合浦地区社会安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得以迅速恢复发展，经济逐渐呈现繁荣。合浦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又促进了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展。同年，安南丁部领派遣使者带着方物上表请求北宋王朝册封，表示愿作宋朝藩属。宋太祖采取和平、安抚政策，封丁部领为检校太尉、交趾郡王，故宋朝的史书，一般称安南为交趾。从此，廉州与交趾的关系，由郡邻变成比邻，两地商品交流由国内经商变成海外贸易。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太宗为了扬国威，增加财赋收入，决定进一步扩大对外国的贸易来往，“遣内侍八赉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番国，匀招进奉，博采香药、犀牙、珍珠、龙脑。每纲赉空名诏书之道，于所至各处赐之”。宋使者带着黄金、丝绸、陶瓷和诏书，抵占城、真腊、三佛齐、渤泥等国，宣扬宋朝的国威和富饶。中国精美的丝织品和陶瓷，吸引着东南亚和西方各国的商人抵达中国进行贸易。由于地理原因，廉州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来往最为密切。据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卷二记载：“钦廉皆号极边，去安南境不远，异时安南舟楫多至廉。”“自其境永安州，朝发暮至。”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廉州设置沿海巡检司，专职接待商舶。贵重商品，则由巡检司专收专卖，名曰“收市”。这样，宋王朝获得大量的赋税收入。此后，宋朝统治者采取注重经济内涵的航海贸易方针，今广西沿海港口成为宋代中国对东南亚各国海上交通和贸易的枢纽。

宋初，首先抵廉州进行海上贸易的是占城国（今越南中部）。其国势力小，便想凭借中国的势力保护自己，因而累“遣使来献”。它几乎每年都向宋朝进贡，有时一年数次。占城使者多从海道经北部湾抵廉州，然后溯南流江北上，直抵中原。随着官方贸易的发展，占城与廉州的民间贸易自然更加密切。与此相反，交趾和廉州的海上贸易却发生摩擦。掌握兵权的交趾黎恒篡位后，奉行扩张政策，一方面将丁部领的儿子和太后逐出皇宫；另一方面派兵多次在合浦县沿海骚扰，大肆抢掠人口财物，洗劫商船，廉州当地百姓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廉州与占城的贸易亦大受影响。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七月，宋太宗为了维持边境的安定与和平，保护廉州的海外贸易，控制南

海交通要道，决定出兵讨伐黎桓。宋军“由邕廉两道并进”：步军由孙余率领，从南宁经龙州抵安南；水军由刘澄等率领，以海门为基地，从今北海港一带出发。结果，宋水军在白藤江口重创黎桓水军。黎桓军队一败涂地，只好上表请罪投降。战争结束后，宋朝统治者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废廉州，移就海门三十里，建太平军”。廉州旧治（今浦北旧州），虽位于南流江下游，但地理位置不及海门镇优越。故宋朝将州治移往海门（今廉州镇）。淳化元年（990年），为了加强友好往来，宋太宗派宋镐等使者从廉州出使交趾。黎桓闻讯，为讨好宋朝，遣使“以船九艘，率三百人至太平军来迎”。他们不惜派陪臣和侍卫乘船，从交趾海道抵廉州，上门迎接宋朝使者。公元993年，黎桓为得到册封，不断遣使向宋朝入贡，表示对宋朝的忠诚。北宋王朝基于既成事实，也就承认黎氏政权，封其为交趾郡王。此期间，双方都保持友好关系。咸平元年（998年），宋朝因边境已安定，便撤销太平军，在海门复设廉州。自此，海门便成为廉州府和合浦县的驻地。据合浦县有关地名史料记载，廉州古城始建于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3年）。宋代古城内外已建有阜民圩、承宣街、还珠街、武安街、文会巷等22条街巷。廉州人口由唐代的3032户，升为宋代的7500户。廉州古城便成为宋代重要的对外贸易重要口岸。

公元997年因宋王朝实力强大，交趾黎桓主动与中国和好，不断向宋朝进贡。据《宋史》记载，交趾王黎桓派遣大臣向宋真宗皇帝进贡宝物，并上表求封，再次被册封为交趾郡王，成为中国的藩国。此后，廉州与交趾贸易来往，正式由国内经商变成海外贸易。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黎至忠继承王位，多次派遣使者，“以犀角、象牙、金银、琉璃等来进贡”，并要求“互市与邕州”。这次，宋真宗赵恒没有应允，对大臣说：“濒海之民，数患交趾侵寇，仍前止许廉州及钦州如洪岩互市。盖为边隅控扼之所，今或直趋内地，事频非便。”于是下诏给地方官员宣布：“诏许交趾互市廉州及钦州如洪岩。”政和年间（1111-1117年），宋王朝认为交趾“自熙宁以来，全不生事，特宽互市之禁”。此后，两国间的互市活动又恢复活跃。因宋王朝经济军事实力强大，交趾统治者十分注意维护与中国边境的和平共处。重和元年（1118年），广西转运使燕瑛曾上表朝廷，“言交人服顺久，毋令阻其贸易”，在廉钦各创“驿所”，设立官方商贾接待站，“令交人就驿博买”。于是，廉州设驿所，成为宋王朝对交趾互市口岸，有力促进当地与东南各国海上经济文化交流和对外贸易得以发展。因而，宋代廉州仍成为我国中原和珠江流域出北部湾傍通交趾等东南亚国家的交通要道，成为广西对外互市的重要商埠。

二、宋代廉州成为交趾等东南亚国家和西方商贾抵此互市之地

宋代，广西海洋文化最大的成之一就是《岭外代答》一书的问世。该书作者是曾任钦州判官的周去非，它在书中详细地介绍广西沿海的经济文化技术的发展概况。1000年，廉州、钦州成为对交趾互市之地。据《岭外代答》记载，宋朝廷在今广西先后设置宜州（今宜山）、横山（今田东）、永平（今宁明县明江镇）、钦州（今钦州市城外江东地）共四个“博易场”，加强中国对外贸易的目的性更强、规模更大。广西外贸的货物有锦、缯、陶瓷和“文书及诸奇之物”。由于当时宋朝在广西设马市，需购买云南大理马（每年3000匹以上），便组织中原内地商人每年运来大量金银、陶瓷、绵绸等商品投入广西市场，满足当地外贸的需要，交趾人以“名香、犀象、金银与吾商易绫、锦、罗布而去”。广西内地“博易场”的繁荣，客观上促进了廉州对东南亚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贸易的发展。

自古钦廉地区是广西唯一海岸，也是交趾百姓获得中国的生产、生活资料和中华文化的重要来源之地。廉州与交趾之间海上交通方便，民间舟楫来往不绝，多以鱼蚌、米、布、香料来钦廉换绵绸、陶瓷、铜器等物。据《岭外代答》记载，富商巨贾在钦廉的经营和贸易，多是“金、银、铜钱、沉香、光香、生香、珍珠、象齿、犀角”，“自蜀贩锦致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辄数千缗”。同时，廉州、钦州、博白、容州（今容县）、郁林州（今玉林市）及邕州（今南宁市）一带，拥有对外互市充足的货源。此外，钦廉沿海产盐，还出产各种海味和贝类，这些都是传统的外销产品。另外，南流江上游的博白、北流、容州一带，“桑柘如林，柘袖遍野，山蚕土桂，闭门成市”。尤其是容州，上接北流，下抵苍梧，“一水直通商旅”。粤桂商贾一方面将外国的舶来品溯南流江经容县销往中原，另一方面亦经容县将当地土货汇集在廉州出口。由廉州出口的主要有锦缎、绸、绢、帛等纺织品，瓷器、陶器和铁锤、铁链、铜器、锡器等金属制品，以及粮、茶、糖、酒等农副产品和纸、笔、墨、书等文化用品。宋代，广西的陶瓷业进入兴盛时期，为海外贸易提供了货源。当时，廉州窑口多，规模较大。烧造技术、制作工艺及产品质量均比隋唐进步。据有关史料记载，“宋元时期，北海现已发现的窑址有：下窑、中窑、上窑、东窑、西窑、常乐缸瓦窑、黄鹂窝瓦窑、红坎窑等等”。其中，下窑遗址位于今银海区福成镇下窑村附近，即福成江的两岸，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100米。“烧造的陶瓷有罐、盆、碗、壶、擂盆等日常生活陶瓷”。“瓷片有青、黄、灰、绿等釉色”，“釉色滋润，火候较高、胎体坚硬”。因而，上窑生产的陶瓷，成为出口的上品。另外，中窑、上窑分别位于今银海区福成镇的中窑村和上窑村。其中，上窑的陶瓷“釉色细，光泽好，火候高”。“1957年7月，广东省文物普查认定为宋代窑址”。另外，东窑位于铁山港区营盘村的东侧，窑址分布在南北长约400米的村庄边缘地带。西窑位于东窑之西，两窑相隔约200米的田垌（中间原有一条古河道）。其规模与产品，与东窑、上窑大体相同。黄鹂窝缸瓦窑，则位于铁山港区南康镇的黄鹂窝村委，现距铁山港海域约2公里，规模较大。常乐缸瓦窑，位于合浦县常乐圩镇北约1.5公里的缸瓦窑村旁，南流江的东侧。由上可见，当时廉州陶瓷产地，均在沿海或南流江边，交通十分方便，利于运输出口。另外，与南流江相接的北流河沿岸，主要瓷窑有藤县中和窑、北流岭洞窑等。据《广西航运史》记载，宋代广西瓷窑40余处，“一年即生产陶器800余万件”。南宋嘉定十年（公元1223年），广西人只有52.8万户、132万人口，“每年显然无法消费如此大量的瓷陶产品”，“外销是宋代广西制瓷业获得发展的最重要原因”。正如《宋史·食货志》记载，宋朝“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绣、瓷漆之属博易”。宋代，廉州沿海地区瓷窑技术的进步，以及广西陶瓷生产规模的扩大，也推动了廉州海运的大发展和对外贸易。尤其，当地生产的“青白瓷”已远销东南亚、西亚和欧洲、东非地区。据《诸蕃志》记载，当时与宋王朝经济文化往来和贸易关系的亚非国家就有56个，而其中由中国出口陶瓷进行贸易的有15个国家和地区。

宋代廉州与东南亚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力地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宋代商贾一方面由中原沿着湘、桂抵廉州经港口出北部湾，向交趾和东南亚各国输出黄金、白银、铜钱、丝绸、陶器、铁器、纸等和手工商品，另一方面从东南亚和西方各国输入外番舶来品。据《粤西丛载》卷十六记载，主要输入商品有金银器皿、熏衣香、降真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线香、白绢、犀角、象牙、纸扇。这些细货，都是宋朝廷要“博买”的商品。当时，交趾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地

区，“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廉州与交趾海道相通，抵交趾的外国商人来中国，大都经过廉州。宋朝在廉州设有“还珠驿”，接待外国商贾和使者，商贾多在此停留。由于来往商舶甚多，北宋在广西设转运使，在廉州设沿海巡检司，具有市舶司的职责，“掌番货海舶经榷贸易之事，以徕远人，通远物”。对商人的货物，按规定抽解为十征其一。当时这种税率并不高，商贾从事贸易活动，大都认为有利可图。这样，“立市舶以通物货。旧法抽解有实数，而取之不苛，输税宽其期，而使之待价，怀远之意实寓焉”。因而，廉州与东南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人员来往络绎不绝，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口岸。

三、宋王朝重视廉州海外交通，促进广西对外贸易发展

宋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客观上推动了廉州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文化的发展。据《广西航运史》记载，北宋时由廉州、钦州沿海港口出发的“海外航线有十三条”。分别为廉州至交趾、占城（今越南中部）、真腊（柬埔寨）、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屿）、阁婆（今印尼的爪哇岛）、故临（今印度西南沿岸奎隆一带）、注辇国（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大秦国（即东罗马帝国）、大食诸国（即阿拉伯帝国）、木兰皮国（约在今非洲西北部和西班牙南部）、昆仑国（即今马达加斯加及附近岛屿）、波斯国（即今伊朗）。宋代中国对外海上交通航线的规模，已超越汉王朝。当时为适应海外运输的需要，广西海洋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其中，宋代廉州造船的技术与工艺在秦汉的基础上获得新的提高。据宋朝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记载，宋代今广西沿海制造的船舶，可载数百人，船体坚固，航器先进。船体的龙骨以杉松为材，船舵以乌婪木制作。船壳板已使用桐油、石灰麻丝等粘缝，以防漏水。大型海船，“有三帆以至十二帆，帆皆以竹为横架，织成席状”，且可随时起落。除风帆外，船上还有橹、桨、篙等人力驱动装置，以在无风或进出港时使用。当时，钦廉沿海能造一种大海船，称“木兰舟”或“广船”，船容数百人，“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造船选材多用钦州盛产的紫荆木和乌榄木，“用以为大船之桅，极天下之妙也。番舶大如广厦，深涉海径数万里，直寄于一桅。他产之桅，长不过三丈。以支持数万斗之蕃舶，率遇大风于深海，未有不中折者。唯钦产椽理紧密，长五丈。以支持万斗之舟，独可胜任，虽有恶风，截然不动，如一丝引千钧于山岳震颓之地，真凌波之至宝也”。钦廉海洋文化技术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当地航海的发展。

北宋时，廉州已拥有先进的海洋文化与航海技术。当时，停靠在廉州沿海的船舶均利用潮汐靠岸卸货。据《岭外代答》卷六记载：“钦廉则朔望大潮，谓之先水。日上一潮，二弦小潮，谓之子水。顷刻竟落，未曾再长。”廉州沿海港口的自然条件优越，海岸以沙磧为主，潮差达一丈五尺。船舶利用大潮靠岸，潮水退时就可以在沙滩上或浅水中卸货。当时廉州的船舶多抵交趾，经冠头岭一带海域扬帆出海，“西南舟行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大盘寨，过永泰万春，即至其国都，不过五日”，海上交通极其方便。另外，廉州海舶又可远航东南亚和西方各国，外国船舶也纷纷从廉州登陆。据史料记载，当时与中国进行海上贸易的国家，以大食（阿拉伯）为最远，其次为故临（今印度奎隆），再次为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三佛齐在海上，扼“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外国商舶自“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上下竺，即竺屿（今马来半岛东南方的小岛）；交洋，即今北部湾一带海面。当时西方商贾抵三佛齐后，除了“入自屯门”（今广东省东莞市南），以抵广州，“入自甲子门”，以抵泉州，余下者，纷纷向正北行舟，

抵廉州与中国进行贸易。

宋代，廉州与东南亚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表现形式为“朝贡贸易”。1010年，宋真宗辟廉州为与交趾互市口岸。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交趾的封建政权常常每隔几年派遣使者，携带“方物”，向宋朝朝贡，宋王朝亦回赐各种礼物。这种“朝贡”关系虽然有政治上、外交上的含义，但主要的还是从中体现出来的经济文化交流。据《宋史》记载，交趾所进贡的物品有金器、象牙、犀角、沉香、珍珠等物，宋王朝回赐的物品有钱币、器具、金带、丝织品和介绍中华文化的书籍等。为显耀大国的风度，宋朝常常将价值大大超过贡品的礼品回赠给交趾。例如，1022年交趾进贡玳瑁、光香等贡品，价值约一千六百八十二贯，宋朝将价值两千贯的物品回赠给交趾。1028年交趾向宋朝进贡香药，计值钱三千贯，而宋朝则回赠给四千贯。安南（交趾）每两三年向宋朝进贡，主要取道廉州，据《钦州志》（嘉靖）卷九《历年志》记载，宋时，“安南入贡，所过州县差夫众多，自静江水路以至容州，又自北流转陆一百二十里至郁林。自郁林水路可至廉州……自廉州航海一日之程即交趾，则从静江而回二千余里可不役一夫，而办诏遂路”。可见安南使者抵河南汴京朝贡后，亦溯汉水，出洞庭，溯湘江，过灵渠，沿静江，抵西江，再溯北流河抵容州，而后从北流沿陆路至郁林，再沿南流江抵廉州，经今北海港一带扬帆从海道返回交趾。随着这种朝贡式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国商人经廉州与交趾的民间贸易更为兴旺。中国抵交趾的商人，“多为贩锦易香”，大都从中原和江南带来丝品，和外番交换香料。沉香、麝香，是东南亚各国向中国输入的主要商品之一。据宋朝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番》记载，中原人士“用广州舶上占城、真腊等香，近年又贵”。然而，由廉州进口的沉香，不但“质重实，多大块，气尤酷烈，不复风味，惟可入药”，而且价格较低廉，自然吸引商贾抵此贸易。廉州流传的一首《送人入安南》古诗写道：“万里波涛几日程，海门飞去片帆轻。鱼龙宫阙浮空上，犀象人家饶树行。宝货远通银豆市，艾花春满竹棚城。日南本是南交地，况复彝王识姓名。”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中国商人由海门启程扬帆，顺北风只需几天就可抵安南。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大观港至冠头岭之海域，即称海门。”中国商贾自海门启程“至安南界约半日，正南至琼州海口约四日……西南至安南海东府约四日”。湘、桂、滇等地的货物多由廉州海门（今廉州镇）港口运往国外，外国货物也源源由海门销往中国内地，使廉州成为宋朝重要对外贸易口岸。

宋代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促进了廉州城经济文化的繁荣。宋代廉州府治，设在位于南流江入海口附近的海门镇。南流江的一条支流（名州江）穿城而过，由乾体入海。此时，海舶可趁潮溯江而上，经乾体、九头庙直抵州城碇泊。因而，廉州江海运输十分畅达，尤其是处于交通枢纽之地的海门镇（今廉州镇）商业兴旺，城市建设发展很快，成为廉州的主要商埠。宋朝把廉州作为广西漕运海盐的中心，同时，促进了廉州城市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当时，苏轼作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典型人物，这位“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在廉州留下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对廉州传统文化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元符三年（1100年），翰林大学士苏轼遭贬岭南，遇徽宗即位，获赦由儋州谪移廉州。他由琼州渡海抵海康，又由海康下舟从海道抵廉州，在风景优美的清乐轩、长春亭（今东坡亭）结庐。古人谓这里：“九曲河桥通碧汉，千家渔火出重渊。长春亭畔明如画，清乐轩前醉欲仙。”苏东坡在廉州仍豪放不羁，抒发真情实感，写下《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枝》《瓶笙》《留别廉州张左藏》等名篇。苏东坡在廉州留下的佳作诗

词，以一种“超然于尘垢之外”的逸怀浩气，一新天下耳目。于是，苏东坡诗词在廉州民间流芳百世。从中可以反映出廉州海门镇当时是一个经济文化繁华的口岸。

城市经济文化的繁华，反过来促进港口的发展。古人曾在合浦县城近郊修有“海角亭”，以示“南辕窃途也”，认为这里远离京城的天涯海角之地。海角亭原址一说约建于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一说是“东汉马援征交趾时在合浦所建”。旧址在州江（南流江经廉州镇入海的一条分支）出海口附近的九头庙一带。这里原是海舶从今北海港溯州江抵廉州镇必经之道。据《廉州府志》记载：“古合浦，汉名郡。地属南海，乃百粤之分。韶广以西，珠崖以东，水万折而归之，故以海角名。”这海角亭故址，是宋代廉州人为纪念汉代合浦郡太守孟尝施政廉明而建的。古人谓这里“亭南江流怒走入海，海潮汐至，潮声轰然”。海角亭内碑刻有宋仁宗时任职廉州团练使的陶弼《记海角亭》诗句。他在诗中云：“骑马客来惊路断，泛舟民去喜帆轻。”从《记海角亭》遗留下来的碑文，可反映宋代廉州经济文化的繁荣，同时说明宋朝以前九头庙至乾体一带已经形成河口港，成为廉州的古港口之一。

四、广西大力发展水上运输使廉州成为宋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

广西的内河运输在唐代以前，从灵渠下桂江横贯西江中部，经南流江到达北部湾，途中经北流河要进行分段运输。到了宋代，广西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促使“海上丝路”更胜于前代。其中，水运路线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主要特征是普遍开辟水陆联运，以延长运输路线，扩大社会效益。其中，廉州拥有五条水陆联运航线。据《广西航运史》记载，第一条航线是广西古水道南北干道的最佳航线，即“由桂江跨灵渠入湘江、洞庭湖、长江、大运河到达关中……由灵渠、桂江转入绣江经南流江至合浦出海”。“自汉以来，至宋元时期即已巩固的这条水运干道，经过千余年的长期实践，是一条最优的行旅航线”。第二条航线是由廉州的石康出发，“经南流江、绣江至梧州的西盐水路漕运线”，“以梧州顺西江进入广东浚水，经南雄、信中、桃江至赣州”。这条航线是广西“秦以来又一古水道，军事物质和贡品多沿此线”。另外，廉州尚有三条海河水陆联运路线。一是经钦江至邕江那陈，转入八尺江至郁江的西盐水路漕运线；二是经钦江、沙坪、平塘江至郁江的水陆联运线；三是由梧州经浔江、绣江、北流江至郁林，再由郁林（今玉林）经南流江至合浦出海。这条“海河联运古水道，自秦汉起开发，至两宋千年不衰”。廉州通过上述五条水陆运线，一网将北部湾海域与广西各条河流联结，把宋代广西航运推向新阶段。

宋代时期，廉州海洋经济文化的发展，体现在漕运海盐的规模扩大。食盐是宋代国库物资，由朝廷调拨、专卖。廉州海岸线曲折，“海岸皆沙土”，“斥卤之地尤多”，发展盐业十分有利。而且，晒盐本小利大。所以，宋代廉州官府十分重视盐业的发展，在廉州沿海建有大规模的盐场，并设白石、石康两个大盐仓，把盐税作为官府财政一项重要收入。由于廉州沿海以盐为特产，因而廉州石康成为当时广西漕盐的枢纽。据《岭外代答》卷五记载：“今日广右漕计在盐而已，盐场滨海，以舟运于廉州石康仓。客贩西盐者，自廉州陆运至郁林，而复可以舟运。”由此说明宋代在广西漕运主要是食盐一项，漕运中心在廉州石康。石康盐仓位于南流江下游，离入海口不远，水陆交通方便。当时廉州沿海的海盐，全靠官府组织漕船运输，“向用局漕挽运，经由武刀港、冠头岭”等处，上溯南流江抵石康。廉州漕运海盐以南流江为干线，“遮一水可散于诸州”，直接把海盐输往广西内地。据《宋史》卷一百八十三记载，廉州白石、石康两个盐仓，每年储运30000石，

负责漕运海盐前往“容、白、钦、化、蒙、龚象、宜、柳、邕、浔、贵、宾、梧、横、南仪、郁林州”。漕盐全由廉州官办，“取其息八分归漕司，二分归本州”。同时，廉州的驻军亦煮盐，“州军亦以八分归漕司”。为了促进漕盐的畅通，宋朝廷“令广西提刑，兼领西路盐事”，在南流江的上游郁林，“置十万仓”，自廉州石康仓运盐往郁林贮存。当时广西陆路运输比不上内河航运发达，漕盐全靠水运。廉州海盐运抵石康，再由石康输往郁林后，通过西江、桂江、左江、右江向各地转运。当时，不仅广西食盐全仰廉州，而且湖南南部也依赖廉州漕盐。张、宝、横、永四郡，郴、道二州，皆附桂林行盐”。然而，桂林行盐是由廉州取道郁林，沿西江，溯桂江运至。正如《岭外代答》卷五记载，凡由廉州漕运供应海盐的州府主要有：“静江府、融、宜、邕、宾、横、柳、象、贵、郁林、贺、梧、藤、浔、容州”。静江府即今桂林。长沙、衡阳、郴州、永州一带食盐，向来由江苏供给。由于“杨么扰洞庭，淮盐不通于湖湘，故广西盐得以越界”。由廉州经郁林每年运8万箩盐抵桂林，转卖给湖南，每箩纳税5缗，广西每年得额外盐税40万缗。

宋代，广西官府除了在廉州沿海港口漕运海盐，还加强珍珠贸易，并向户丁抽取大批珍珠、玳瑁等珍货上贡朝廷。据《宋史》卷一百八十六记载：“盖珠池在廉州泛海十余里”。其中“珠母海”，在冠头岭东南面海中，即今铁山港区白龙港至北海港一带水域。这里百姓每年养殖大量珍珠，官府派户丁（抽取珍珠的差役）向珠民和抵港番舶抽取珍珠。冠头岭下的南漓村，曾名“南漓角”，约始于宋朝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由于它面向北部湾，背靠冠头岭，有一天然港湾可泊船，每年九月至次年四月，此处“北风甚利”。广东、广西船舶多从这里起航扬帆，向南前往交趾、占城等国。因而，古代南漓成为我国出北部湾旁通东南亚的一个重要港口。1976年，该处扩建渔港时，曾发掘出两艘腐朽的船体，船内装满珍珠贝。北海市建港委员会即取两公斤珍珠贝（内藏已变质的珍珠）和船体板寄给北京有关部门化验。经北京大学以同位素质谱分析法进行化验鉴定，是距今800年的珍珠贝。上述科学化验证明，宋代南漓一带是合浦珍珠产地之一，与史籍记载是相符合的。宋朝是廉州“珠禁”较为宽松的年代，时罢时采。据《文献通考》记载：“宋太平兴国二年，贡珠百斤。七年，贡五十斤，径寸者三；八年贡六百一十斤，皆珠场所采。”天圣五年（1027年），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朝皇帝曾下诏廉州罢贡珠宝，珠民自贸，繁荣珠市。采珠产业的发展，客观上刺激了廉州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公元1127年，金朝攻陷汴京，北宋告亡。次年，宋朝廷南渡并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由于边患紧张，国库匮乏，为维持统治集团的以及庞大的军费开支，南宋政权认为：“市舶之利，颇取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宋会要辑稿》）因而，南宋朝廷竭力推进廉州航海贸易和漕运食盐，作为税收来源。廉州官府除了把田赋、商舶的税收提高几倍，还把食盐官卖作为财赋的主要收入。盐税之利，迫使廉州官府采取措施，促使盐业迅速发展。结果，宋朝末期廉州沿海盐场后来发展成15处，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由于“南流江上通郁林，下通廉州，舟楫通行，上至州界之船埠，下达于海”，便成为宋代广西转运漕运海盐之航路。官府为了获得盐税之利，“每岁督商行销”。

广西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反过来促进廉州经济文化的繁荣。宋朝时，古海湾尚深入至廉州镇九头岭一带。大海船趁潮从州江（南流江的一条分支）河口溯江而上，经九头岭抵州城驶至海角亭附近停泊，海门镇（廉州镇）成为合浦的主要商埠。官吏或商贾搭乘海舶，多在海角亭内停留候潮。后人曾在今海角亭旁建有天妃庙，作为商贾出海祈祷之所。宋代苏东坡曾在亭内大书“万

里瞻天”，手迹尚存，后人临摹其遗迹于匾额上。后来，苏东坡调任静州节度使，亦溯南流江北上，“至北流河作木筏下水，历容、藤，至梧”。然后，雇舟溯桂江而上，过灵渠，沿湘江抵静州。从苏东坡北行湖南的路线，可以看出南流江、北流河和桂江这条水道，在宋代仍是我国一条重要的内河交通航线，亦是宋朝在廉州漕运海盐的干线。乾道九年（1173年），据《文献通考》记载，交趾使臣中卫大夫尹子思等向宋朝人贡，自临安（今杭州）经静江府（府治今桂林）返回。广西经略司押办官员在接待中因差夫众多，安排走廉州漕盐航路。“自静江水路可至容州北流县，兼有回脚盐船，若量支水脚和雇工，无不乐从；自北流转陆一百二十里至郁林州（今玉林），自有车户运盐车可载”，“自郁林水路可至廉州，亦有回脚盐船。自廉州航海一日之程，即达交趾……”由此可见，廉州至交趾航路在宋代水运交通中的地位及作用十分重要。

由于廉州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方便，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不但成为宋朝广西航海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而且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对外重要门户。

（作者系北海港培训中心原主任、高级讲师，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文史研究部部长、常务理事）